

## 中國崛起與文化危機

當時代邁入二十一世紀時，我們身為中國人，何等盼望這也是中國再度崛起的時機！然而我們也必須坦誠地面對一個嚴肅的問題：就是我們的中國文化，是否能導引崛起後的中國？依據歷史學家湯恩比(Arnold J. Toynbee)的觀點，任何國家的崛起或衰微，必然與他們文化的變遷與更新有關。既然如此，那麼我們就必須自問：中國文化將來的走向為何？甚至即使中國崛起了，中國在世界舞臺的角色為何？這都是我們必須深思的問題。

### I. 當前中國文化的危機

許多人在思考的問題是：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，在這現代化的浪潮中是否仍能挺立得住？中國的文化，能否為民族的未來發展提出甚麼貢獻？因此，中國文化目前正面臨著空前的挑戰，這是不爭的事實。但是這是否算是「文化危機」呢？卻是見仁見智的問題。但是大陸知識份子(包括流亡或留學海外者)，

#### (1) 港台地區對中國文化危機之看法

港台地區的中國知識份子，對中國文化的優越性及適應性，多持比較樂觀的態度。所以基本上是比较傾向於維護傳統文化的，尤其在台灣。因此，台港的知識份子，尤其是老一輩的學人如錢穆、牟宗三、徐復觀等人，莫不以「捍衛中國文化」為己任。在他們來看，只要好好培植，中國文化將來必有在世界各地發揚光大的一天。但台灣的章政通曾明確地表示：“新儒家們因根本的目的在宣揚傳統，因此著眼點都側重在傳統文化的優良的一面。但因缺乏理智的批判態度，有時就不免把那些優點過份放大。”

#### (2) 大陸學者對中國文化之批判

在中國大陸方面，基本上，受到政治環境和社會現況的影響。大陸的知識份子中，因對中國的災難經歷得較切，對中國問題的嚴重性也看得較深，所以對中國傳統文化多半持比較負面的看法，批判性也較強。但是如今在思考的方式及態度方面，還是各有不同，大致上可分為三種路線：

- (1) 中國文化書院派—以老一代知識份子為主，也代表目前官方的立場；
- (2) 走向未來派—這一派以文革時期的「憤青」為主，對傳統文化批判性很強；
- (3) 新思潮派—這一派以翻譯、引介西方各類思潮為主，較不尖銳地批判。

總的來說，大陸當代知識份子(特別是年青的一代)的言論，如劉曉波、包遵信等人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否定態度，幾乎是五四時期的翻版。但若是從他們經過文革的心路歷程去體會的話，他們之所以採取這種激烈的批判態度，也就不難理解了。

#### (3) 海外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立場及態度

在海外，特別是北美，中國的知識份子對中國文化的態度，與港台或大陸地區又有顯著的不同。這些海外學者，如杜維明、林毓生、成中英、劉述先、余英時等人，都是學貫古今、中外兼修的高手。他們不但有完整的西方治學方法之訓練，而且又在美國定居、任教多年，對西方文化耳濡目染頗深，在比較中西文化之異同時，自然更鞭辟入理得多。因此，大體而言，他們對中國文化的態度，比較不會陷入愛憎分明的兩種極端裏，在欣賞之餘，仍有深刻而且極有見地的批判。

## II. 中國社會的特徵與缺失

中國傳統文化在「現代化」的洪濤駭浪中，似乎有點搖搖欲墜的樣子。所以，不可否認的，中國文化正面臨空前的挑戰，而中國傳統社會的弱點，也從未像此時此刻那樣明顯地曝露出來。用最通俗的說法，中國社會的特徵，如果借用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時曾說的一句話來形容，那就是：“和尚打傘，無「髮」（「法」）無「天」”。

### 1. 「無法」—缺乏法治精神

中國社會的第一個特徵就是「缺乏法治精神」。當代中國知識份子都注意到，海峽兩岸的中國社會一直到今天，基本上仍然是「人治」的社會，而非「法治」的社會。因此在台灣流行的話是：“立法從嚴，執法從寬。”；大陸的順口溜則是：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。”在中國人的心目中，「法」是死的，「人」是活的。所謂「法律的神聖性」觀念，對中國人而言，根本是不存在的。因此，同樣的法律和制度，很可能從西方國家一搬到台灣或大陸，就全變了樣了。

西方國家的法治觀念，一來是源自於羅馬文化的精神，二來是由於猶太—基督教的思想。前者是顯而易見的，也多有學者論及，因此不須贅言。但是後者則常被忽略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西方國家繼承了羅馬帝國的法律和制度，又藉著基督教的薰陶，強化了他們的法治精神。

### 2. 「無天」—缺乏超越的上帝

中國傳統社會的第二個特徵是，對外在而超越的上帝—也就是西方概念中的「創造之神」—觀念極為模糊，甚至近乎否定。孔子是務實的學者，他「不語怪、力、亂、神」；對死亡之後的事，他說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。」；他對鬼神的態度是：「敬鬼神而遠之」。所以，不論在先秦以前的古人究竟是否有「造物主」的概念，至少絕大多數的學者們同意，這種「造物主」的觀念，自西漢儒家興起之後，已越來越淡薄，甚至近乎絕跡了。

當然在儒家的「大傳統」之外，魏晉之後的平民百姓，受佛道兩教的影響，卻生活在滿天神佛、遍地鬼魅的「小傳統」中。可是總的來說，中國人傳統上對於「是否有一位創造宇宙的獨一真神」之問題，大部份不是採取多神論的立場，就是傾向於無神論，很少是採取「獨一神論」的。

在這樣的環境下，中國人缺乏一種對「外在的、超越的、創造的神」之概念。因此中國人尋求的是一種「內在的超越」，而非「外在的超越」；乃是「自力式」的拯救，而非「外力式」的救贖。這種宇宙觀的差異，也導致中國和西方國家，在科學發展及倫理道德實踐上的不同。例如由於缺乏「外在超越」之神之概念，中國的道德倫理容易在應用上產生僵化和種種偏頗的現象。在五倫關係中，會漸漸將「君臣」和「父子」等關係絕對化。這種「愚忠」、「愚孝」的行動，會造成「禮教吃人」的結果。相對的，基督教的倫理觀是以神為中心、為參考點的，所有的倫理規範都必須在這個絕對真理之下被檢驗、受修正。

由此看來，「無法」、「無天」是中國社會的特徵，也成為我們的文化弱點。因此，當我們談到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會通時，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在這兩方面，來補中國文化之不足。否則中國在面對變化萬千的現代社會，將會自亂手腳、不知所措。